

鸡
鸣
丛
书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

陈平原 著

版
社

鸡鸣丛书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

陈平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G12
19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陈平原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

(鸡鸣丛书)

ISBN 7-02-004425-5

I. 当… II. 陈…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107 号

责任编辑:李建军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

Dang Dai Zhong Guo Ren Wen Guan Cha

陈平原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02-004425-5/B·300

定价:14.00 元

总 序

董 健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于1999年底经专家评审,被教育部批准公布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使它蒙上了一层浓厚的“体制化”的色彩。因此而得到的指导与资助,固然是好事,但也使学术研究这种极需“个人化”与“自由度”的工作,在运作上平添了不少机械的“行政气”。种种非学术性的检查、汇报,“量化”管理、等因奉此,掣肘多多。

然而,三年以来,该中心全体研究人员,不论是来自本校的还是外校的,也不论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大家兢兢业业,克服重重困难,做了不少艰苦的研究工作。应该说,取得的成绩是颇为显著的。单就中心的重大科研项目来说,已经完成的有两项,这就是丁帆、许志英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114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400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正在进行中的有三项,即温儒敏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陈思和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与胡星亮主持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研究。还有一些中小型课题也在各位研究人员的手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其中不少的已经以论文形式发表。另外,中心召开的三

次学术研讨会(其中一次为国际会议)的论文集《多元语境下的精神图景》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也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为了检阅本中心研究工作的实绩,进一步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我们从今年开始着手编辑出版“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文库”鸡鸣丛书。今年先出第一辑计 10 种,都是中心专职或兼职人员的研究成果。

丛书取名“鸡鸣”,固然会叫人想到它的地方特色(南京有鸡鸣山、鸡鸣寺),也隐含着表彰勤奋、良知之意(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与呼唤自由、光明之意(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在我们研究中心来说,首先还是出自一种希望建立一个学术高地的“野心”。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挂牌不少,然而“基地”如果仅仅去“填报表”、“出数字”而枉费精力,却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高地,那就徒有其名。“鸡鸣”之称自然会唤起一种学术高地的意念。为什么这么说呢?鸡鸣山是巍巍钟山伸进南京城内的一脉,早在明朝初年(14 世纪),此山就是“国子监”之所在地,用今天的话说,这里有一个“大学城”。清朝末年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2 年始),就坐落在这个昔日大学城的遗址上,此亦属我国现代大学源头之一,当时号称“最为新政大端”。三江之后是两江师范学堂(1905 年始)、东南高师(1915 年始),再接下来就是东南大学(1921 年始)、国立中央大学(1927 年始)、南京大学(1949 年始),悠悠百年,延绵不断,这座鸡鸣山就是学术高地的象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也与中央大学为邻,紧靠在鸡鸣山的怀抱里。即使是在 40 年代国民党最腐败不堪的年头,大学和研究院这样的学术和精神的高地

都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整个社会上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清流，抗拒着滚滚而来的社会浊浪。1948年鸡鸣山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它作为一个体制化行为而高度体现了政治上的宽容与学术上的自由，这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颇为乐道的一段佳话。当时选出的院士，人文组28人个个都是学界巨子，即使在政治上为当局所不满的左翼学者如郭沫若、马寅初之辈，亦皆名列其中，而有些颇得官方赏识的学者却名落孙山。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术的权威由是而立。显然，建立学术高地，不仅要严防社会腐败之风（目前此风正猛烈地向我们袭来）对学术界的侵袭，而且要时时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对此，我们有颇多的感慨与期待，同时也是怀有信心的。

其次，看中“鸡鸣”这个名字，还因为鸡鸣山上有座鸡鸣寺，鸡鸣寺里有座豁蒙楼。古寺的晨钟暮鼓，往高处讲，自然可以引出一些有关人的精神生活与精神状态的话题，这里且不去说它。单是这豁蒙楼，就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颇有些警诫的意义。豁蒙之义与启蒙相通。中国人吃尽了受蒙蔽之苦，但自从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说五四启蒙早已过时。然而看看近十多年的文学界吧，譬如，不久前我还看到一位法学家竟然出面捍卫“样板戏”里的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这种种怪现状不都在说明着未经启蒙的精神蒙昧吗？我们的文学研究难道对此能漠然视之吗？

豁蒙楼是张之洞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两年之后，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六年之后，为纪念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修建的。杨锐为政治改革触怒专制主义而掉了脑袋。张之洞重游鸡鸣寺，忆起甲午中日战起之年与杨锐同登此寺置酒畅谈、纵论古今，为国势阽危而痛叹的情景，似乎对当年学生吟咏杜甫“朗咏六公

篇,忧来豁蒙蔽”的诗句又生出了一层系于现实的解读,遂倡议起楼,并亲笔题“豁蒙楼”匾额。看来,一切有点求新、求变头脑的人都有一种反蒙蔽的焦灼感。豁蒙者,解蔽也。看清了遮盖、蒙蔽之物而将其揭去,叫人心明眼亮起来。这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譬如在鸡鸣寺建此楼之时,为了登楼远望,一览湖光山色,张之洞要求尽伐近边的丛木,这就是给自然景观除去了遮蔽。精神上的豁蒙当然是更加困难的。中国古人讲“正心”、“明道”、“解惑”、“劝学”、“致良知”等等,多少也有些精神豁蒙的意思在,但在那个专制主义的文化大框架之内,所谓豁蒙往往转来转去又变成了新的蒙蔽。专制必愚民,愚民必施蒙蔽之术,此为铁律,谁也破除不了的,即使在当代亦难免。就说 20 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吧,我们至今还记得,人一犯错误就检讨说受了蒙蔽,然后被“代表正确”的人教导一番,“心明眼亮”地去“战斗”,但不久就又有新一轮的“正确者”来宣布你再一次受了蒙蔽。清华大学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何以至此?等到“文革”噩梦一醒,才知道当时全民都处在一个精神蒙昧的时代。

真正的思想精神上的豁蒙,现在叫启蒙(enlightenment),这是从 18 世纪西方启蒙主义运动才开始的事。在中国,五四启蒙打开了人的思想、精神的新境界,是人与文学的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课。但是,老的“左派”说,启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已被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所取代,现在再讲启蒙,就要“启”出反党的思想。所以,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曾被粗暴查禁,并受到批判。“新左派”则说,启蒙是西方来的“殖民话语”(按:此言本身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话语),要捍卫我民族独立性,应拒之于国门之外。马克思主义只能吸纳、包容而不可能颠覆、取代启

蒙主义。有些新派论者以“审美现代性”否定“资产阶级现代性”中的启蒙精神,也是很片面的。只要你承认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具有共同与共通之处,你就不能不会看到现代启蒙的核心精神之所在,这就是:使人告别奴隶状态,做一个独立自主之人;告别蒙昧状态,做一个心明眼亮之人;告别迷信盲从状态,做一个明理自觉、个性健全之人;告别视官、上司为父母、为老爷的传统的臣民状态,做一个敢于捍卫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凡此种种,中外先贤多有系统阐述,虽是老生常谈,至少在中国却并未过时。凡此种种,关乎民主、自由之制度建设,均为人类共同与共通的追求,早已超越了阶级与国度,没有什么你强加于我、我强加于你的问题。这里用得上孙中山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文学拒绝启蒙,便不出政治工具与庸人玩物两途,这当然是我辈同仁所高度警惕的。至今还有不少入将“启蒙”与“政治”混为一谈,将“去政治化”与“反启蒙”作为一件事。岂不知有些政治行为本身,如果它不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它就必然是以蒙蔽人民为前提的。

再次,“鸡鸣”之称中的一个“鸣”字,至今仍不失其对文人学子的一种莫可名状的诱惑力。吾辈既为文人学子,便不可不思;思而有得,便不可不鸣;鸣而遇到不同之见或受权威压制,便不可不进而争、进而再鸣。如此往复无已,学术便得到发展。1957年“大鸣大放”虽然吃了苦,但人们至今难以忘怀那个短暂的学术春天所显示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气。最近十多年来,学术环境相对来说比以前是宽松得多了,“多元化”的口号也叫得颇为响亮,但总也形不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鸡零狗碎、庸俗不堪、充满广告味的“热点”(如文学界为所谓“名誉权”打官司之

类)倒是不断出现,也时有某某领域某某人有某某“新说”、某某“新论”的报道,但多为炒作,认真严肃的学术争鸣却是没有的。归根结底,这是学术界独立自由的创造精神的萎缩所致。简单化的、直线的“两元对立”(alternative)的思维模式已经使我们的学术受害匪浅。要神化鲁迅,就必把胡适妖魔化,或者反之。为了冲破“鲁郭茅”的评价格局,便非把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抬得更高不行。这种非此即彼的视角,叫人辨不清历史的真实色彩。很少有人从综合的文化效应上,从人与文学之现代化总趋势上,去研究鲁迅与胡适的共同价值及其在今天的意义。如鲁迅主张改造贯为人奴而麻木不仁的“国民性”,张大“个性之尊”,呼唤“人国”之建立;胡适则鼓吹健康的“个人主义”,这在人的现代性追求上是一致的。又如关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再造,鲁迅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胡适则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者相通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一定要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首先被丢弃的往往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再比如,现在讲“民族性”、“民族精神”很时髦,但很少有人从鲁迅、胡适已达到的思想高度上来揭示“民族性”、“民族精神”之反现代性的巨大负面影响。只顾顺着“国情”、“中国特色”去讲,所谓“中国化”就往往不是化向新、化向现代,而是化向旧、化向前现代、反现代,就像鲁迅所说的:“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深度争鸣的缺失,还因为我们往往在貌似“多元化”的众声喧哗中,找不准价值的定位。主张“多元化”,提倡学术上互相宽容与尊重,决不意味着无比较、无权衡、无轩轻、无选择。面对互相对立的思潮与倾向,不偏不倚而“执中”就行了吗?孟夫子说

得很明白：“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里讲的这个“权”字非常重要。权就是秤锤，没有它，你无以知轻重。所以孟子认为，没有权衡的“执中”仍然是片面的、偏于一端的“执一”。现在有些貌似很“公允”、很“折中”的理论，其实是很褊狭的。褊狭之风与浮躁心情有关。孟子在讲到无“权”之害时，举了个生动的比喻：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的人，别看他吃喝得津津有味，但其实他是得不到“饮食之正”的，因为口腹的“饥渴之害”使他不暇掂量、选择，不能沉着、从容地做事。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后现代”的鼓吹者，有时就会露出这种“吃相”来。这样吃，就难免从垃圾里吃出“美味”——比如，从“文革”里品出“民主意识”，从“样板戏”里品出“后现代性”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个既有价值定位又不至于定于一尊的深度争鸣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

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评论与研究，说到底就是苦心孤诣地把那么一点“思”、一些“感”用语言表达出来。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做“言说”(discourse)。说什么？怎么说？这是言说水平的问题；向谁说？听谁说？这是言说对象的问题。心之所感有正邪，思之所得有深浅，言之所形有是非，这里边是大有讲究的。大抵古人早就感到了言说之难吧——晋朝有个叫刘处宗的人，家养一只会说人话的长鸣鸡。这位刘先生就是在与鸡的对谈当中“言功大进”，即大大提高了言说的水平。故而古人著书立说多称“鸡谈”、“鸡谭”云云。这个故事见于南朝宋刘义庆辑录的《幽明录》，那时的人看重言谈之功，才会编出这么一说。鸡当然是不可能说人话的。这一方面说明古人亟欲提高言说水平的迫切性，一方面也说明言说对象之难以到位的困惑与无奈。与其对牛弹琴，不如沉默与独语。与通人语的鸡对谈不是比与不通

情理的人对谈更有益吗？我们的《鸡鸣丛书》当然面临着当代世界的言说之难。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领域，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听谁说？”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矩。这些概念和规矩，一直都在牢牢地统治着我们的头脑。如今，必须对它们一一加以梳理和甄别，有些应该被质疑、被替代、被颠覆。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当然是困难的，但我们会在困难之中言说出新的水平来，这样，也就会逐渐建起学术的高地。

2003年5月30日初稿

7月20日改定

于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自序

十年前写过一则短文，题目就叫《十年一觉》，说的是与钱理群、黄子平二君共同营造的“十载燕园梦”如何飘然远逝。文章中有这么几句颇为伤感的话：“屈指算来，从第一次到北大寻梦，到今秋东渡访学，刚好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更何况适逢从‘而立’走向‘不惑’！”十年后重读此文，即便撇开杜牧诗句，“十年一觉”四字，也依旧撼人心魄。

上回发此感慨，是为三人合撰的一册小书作序；这回呢，则是谈论自家的文化评论集。应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之邀，决意将近年所撰关于当代中国的文章结集出版。挑挑拣拣中，突然发现一个秘密——又是一个“十年一觉”！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我之基于学术立场“考古证今”，起点应为1993。正是这一年，以剖析“精英文化的失落”以及“人文学者的选择”为契机，我开始以“业余爱好者”的眼光与架势，偶尔涉足“当代中国”话题。

面对当代中国诸多让你或悲或喜、亦惊亦叹的文化现象，张大嘴巴的同时，也不由得睁圆了眼睛，观察、记录、分析、考量，甚至直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记得很清楚，当初之所以“越界”，撰文剖析“当代中国”，不外想借此保持与当下文化建设“不即不离”的联系。这一潜在动机，诱使我撰文时不避琐碎，尽可能多

地保留感性资料,以便后来者得以从容地进入历史。这其实是我自己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学术史的体会,“立此存照”的精细描述,往往比不着边际的高头讲章,更能呈现历史的某一面相。

并非此行专家,自愿扮演“观察者”角色,这既解释了我为何无法展开深入的学理探究,也给自己保留了海阔天空纵横驰骋的自由。从相当热门的学术史、民族主义、武侠小说,到近乎明日黄花的文化人与学院派的分工、文言与白话的对峙、政治与文学的纠葛,还有方兴未艾的“北京学”,以及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的关系等,都被纳入本书考察的范围。只是囿于“观察者”立场,加上会议论文或专题演讲的文体特征,使得本书的论述“鲜活”有余而“深邃”不足。就近观察一个生气淋漓、充满动感的社会,好处是“真切”,缺点则是容易流于“浮泛”。对于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来说,“蜻蜓点水”、“大而无当”之类的讥讽,只好预先认领了。

惟一聊以自慰的是,这种“非专业”的观察,很可能带入别样的眼光与方法,有时又为专门家所不及。况且,“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卞之琳《断章》),焉知今日粗浅的描绘与论述,他年不会成为学者有用的史料?念及此,于是不避浅陋,选择了近十年间所撰十文,奉献给关注当代中国文化进程的读者。

悠悠十年,观察对象在变,观察者本身也在变。本书的论述,从思想到文体,前后并不完全一致。为了存真,各文依写作及发表的顺序排列,除统一体例、调整注释外,文章内容不作改动。需要说明的是,前四章多年前曾分别入集,这回抽出合刊,为的是自家思路的完整。区区私心,敬请读者谅解。

2003年3月31日于京北西三旗

目 录

自 序	1
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	1
一 商品经济大潮与通俗文化的挑战	1
二 文化精英的社会角色及经济地位	6
三 泛政治意识、革命崇拜以及平民文学的迷思	13
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	20
一 人文学者的失落感	20
二 三个时期三种研究心态	24
三 文化人与学院派	29
四 重建学术自信	35
学术史·知识分子·民族主义	40
一 学术史	41
二 知识分子	48
三 民族主义	54
附录一：“民族主义”及其他	58
“通俗小说”在中国	71
一 从“金庸风波”说起	71
二 “通俗小说”与“平民文学”	74
三 中西冲突与雅俗对峙	80

四 学校与报刊的文化品格	84
五 世纪末的挑战	90
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	92
一 “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	93
二 关于“两种文化”的论争及其超越	97
三 网络时代的文化承传	104
四 答听众问	111
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	121
一 问题的提出	121
二 学风的转变与文言的重现	126
三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的顺利推广	132
四 关于高考作文《赤兔之死》的论争	137
五 如何感受纳兰性德	139
六 怎样看待文言之“模仿秀”	142
“五方杂处”说北京	147
一 为什么是北京	147
二 作为旅游手册的北京	151
三 作为乡邦文献的北京	155
四 作为历史记忆的北京	158
五 作为文学想象的北京	161
六 作为研究方法的北京	165
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	170
一 “学者在电视上露脸”能否“得分”	171
二 人文学者如何面对大众传媒	176
三 大众传媒能否赞助现代学术	182
四 在“拒绝”与“同化”之间	189

武侠小说与功夫电影	195
一 关于游侠的想象	195
二 武侠小说作为学术课题	198
三 从武侠小说到功夫电影	200
四 打斗场面与特技表演	203
附录二:我与武侠小说研究	206
怀念“小说的世纪”	216
一 “小说的世纪”	217
二 政治与文学的纠葛	220
三 漫无涯际的文类	231
四 “新世纪”的困惑	235
附录三:“文学”如何“教育”	240

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

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间的对话与转化,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相对于秦汉或者明清这些大、小传统交流较为畅通的时代^①,近百年中国雅、俗文化的急剧转化仍是个无法回避的严肃课题。晚清维新志士考虑的是如何使精英文化“通于俗”,以利于改良群治;如今“读书人”讨论的是在通俗文化大潮冲击下,如何为精英文化保留一席之地。表面上还是雅、俗对话,可主动权和立足点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物换星移,百年一觉,当初苦苦追求“通于俗”、“大众化”的精英们,如今反过来,必须为捍卫自己的文化理想而抗争。这一大趋势,说好听是通俗文化的崛起,说不好听则是精英文化的失落。

一 商品经济大潮与通俗文化的挑战

通俗文化的崛起非自今日始,精英文化的失落也不是中国

* 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展望: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1993 年 3 月 10—12 日)的论文。

① 参阅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均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